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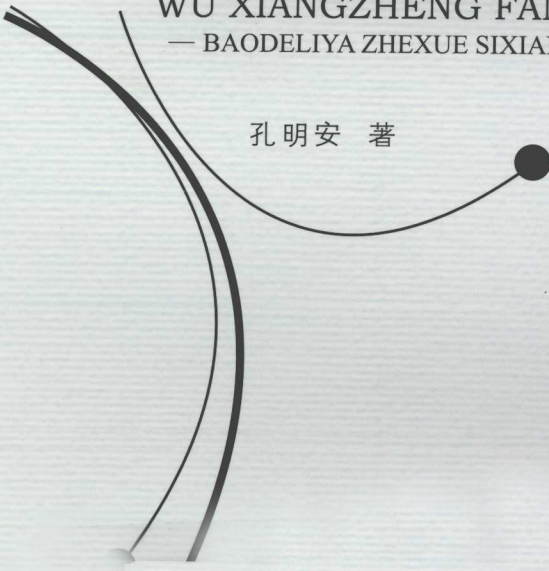
物·象征·仿真

—— 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

WU XIANGZHENG FANGZHEN

— BAODELIYA ZHAXUE SIXIANG YANJIU

孔明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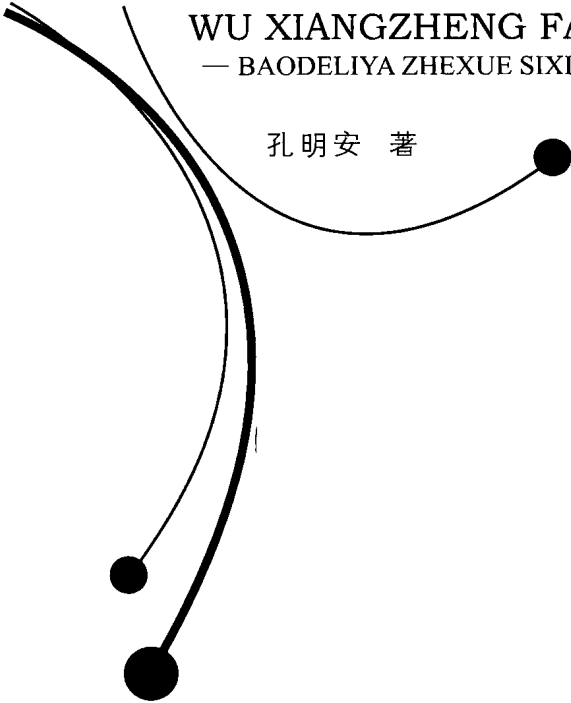
安徽师大学出版社

物·象征·仿真

——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

WU XIANGZHENG FANGZHEN
— BAODELIYA ZHIXUE SIXIANG YANJIU

孔明安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言

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 1929 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东北部的莱姆 (Reims) 的一个普通公务员之家。据他自己在《冷酷的回忆 II》(1987-1990) 中自述, 其祖父是一个农夫, 父亲是一个提前退休的公务员。鲍德里亚早年当过中学老师, 后成了一名大学教师, 师从列斐伏尔, 随后又与列斐伏尔分道扬镳。20 世纪 60 ~ 70 年代, 他在法国的南特大学担任教职, 并一直工作至退休。鲍德里亚特立独行, 退休后仍活跃于西方学界, 但多游离于主流学术圈之外, 而且不太“合群”, 这与其学术的怪异风格和晦涩的文风也有颇多吻合之处。据说, 他直到退休也一直没有得到教授的位置, 这听来令人扼腕, 也多少有点不可思议。想来鲍德里亚这么一位蜚声欧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 也落得如此的“悲惨”地位, 令人不禁联想到西方学界之评价体制也有诸多“不公”之处, 并非如我们常人想象得那般“美好”和“理想”。作为一个反对西方社会体制和制度压抑的左派斗士, 此公对那些正规的西方学术体制所谓的“头衔”可能也不大在乎, 并不放在心上。^①好在“墙内开花墙外香”, 鲍德里亚的声名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流行而越过法兰西的国界, 跨越大西洋, 波及美利坚和北美大陆。80 年代之后, 鲍氏常应邀至北美大陆讲学, 并遍游北美各地, 遂将其游历观感及其思想所得编写成厚厚五卷本的《冷酷的回忆》。读者如有闲暇兴趣, 尽可以去掌灯夜览;

^① 有关鲍德里亚的自传、学术经历和个性的介绍, 可参阅台湾学者林志明翻译的《物体系》的“译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1 年版。

不过须得有“闲情逸致”，否则，厚厚的五卷本也非一时得以尽览，且也难以得其要旨。

鲍氏著作等身，包括已经出版的小薄册子，数量达四五十本之多，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当推其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该书不仅包括了其核心的思想，即“象征交换原则”，而且还对西方自古以来死亡的谱系做了追踪考察，并就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关系做了细致的论述。不仅如此，该书承上启下，上接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烈批判，包括马克思的劳动、生产、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生产方式理论，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等，也都在鲍氏的批判之列；下续对 20 世纪末西方技术社会及其体制的研究和批判，如大众媒体批判、诱惑和致命策略的批判，等等。因而，可以说，《象征交换与死亡》集鲍氏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对其他理论的批判于一身。至于鲍氏 80 年代之后的几部重要著作，如《致命策略》、《恶的透明性》、《完美的罪行》和《不可能的交换》，等等，都不过是《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有关论题的具体展开，或是对 20 世纪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等现代技术统治的象征交换的批判而已。因此，称《象征交换与死亡》为鲍氏的代表作，的确可谓名至实归。读者如对鲍氏思想有兴趣，此书不可不读。

鲍德里亚的学术观点一生多变。现我们简要地将其观点做如下三点概括：

其一，鲍氏早期与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综合来看，鲍德里亚早期的确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其立论及其观点，大多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表现为其《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所论仍受制于马克思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典型的是他对“辩证法”和“异化论”的认可。在《物体系》中，他将现代技术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类比为黑格尔的“主-奴”关系，这一方法显然是他对黑格尔辩证分析方法的继承和运用；另外，他对消费社会中个体在

“符号消费”面前异化现象的揭示,也反映了他有关消费社会的分析仍然受制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论”的影响;退一步讲,这至少表明他与黑格尔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仍存在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消费社会》一书中有关“布拉格的大学生”这一故事就是异化论分析的典型案例。这一现象既与他博士期间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有关,也与其早期大量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本雅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有关。鲍德里亚早期从事德国戏剧大师、反希特勒的左派作家布莱希特(1898-1956)的研究和翻译,并与法国符号学家巴特过往甚密,深受他的影响。他在一次专访中,也毫不隐晦地承认他与德国文化的关系,他说:“我非常熟悉德国浪漫主义,……我对德国文化也非常了解。我读了很多德文著作,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受到了德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读过尼采、叔本华和其他人的著作……我概要地读过海德格尔的著作,但我不能肯定其对我有多大影响。”^①

至于鲍德里亚是否受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回答是肯定的。他在专访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从鲍德里亚的早期和中期著作中,可以经常看到他对马尔库塞有关论断的引述,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诱惑》中还不时出现马尔库塞的名字及其论点。所以,说鲍德里亚早期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应该是有文本依据的。

其二,“象征交换原则”始终是其立论和进行社会批判的根据。象征交换原则是鲍氏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提出并详论的一个观点。它是一个来自于古代社会,但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的古老社会准则,是西方社会学著名大师迪尔凯姆的外甥莫斯在《论礼物》中提出的一种人类学的理论,其核心是要求交换双方必须建立在“互惠性、可逆性”等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交往准则。鲍氏在继承莫斯这一准则的基础上,将这一“原则”发扬光大,并将其应

^① M.Gane, *Baudrillard Live : Selected Interview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21.

用于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应用于现代技术的社会批判之中。至于鲍德里亚为什么对象征交换原则情有独钟,原因非常复杂,也难以在此给出一个详细的解答。但从鲍氏的出身背景及其成长经历看,他对“原始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眷恋或“情结”。这一点在有关的回忆自述中可见端倪。

鲍氏在《冷酷的回忆Ⅱ》(1987-1990)中追寻了自身的家庭背景,以及它对其后来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鲍氏自认为出身于农家,其祖父是一个农民,父亲是一个提前退休的公务员。他对农民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对土地和大自然的依恋和感情非常了解。他认为像他祖父那样的农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相信命运式的“懒惰的”生活方式,它无需个人的自我奋斗,也无需竞争,等等。所以,他说:“这种懒惰本质是农民式的,其基础是建立在一个功劳报偿和‘自然’平衡的感情上。也就是说,从来就不需要做得太多。这是一项慎重和尊重的原则,对象是工作和土地的对等:农民自然有所付出,但最终还是由土地和神来给予所余之物:而(这)是最根本的必要的。这个原则尊重的是那些并非由工作而将永远不会由工作而来之物。随着这个原则而来的,是对命定性的倾向癖好。惰性是一种命定的策略,命定性是一种懒惰的策略。也就是从它身上,我得出了一种既极端又懒惰的世界观。不论事情如何演变,我也不会去更改它。我憎恶我身边的市民们的喧嚣活动,他们的主动积极、社会责任、野心和竞争。这些是外原的、城市的、有竞争力有表现的、自命不凡的价值。这些是工业文明的品质。懒惰则是一个自然的能量。”^①

鲍德里亚家庭的这种生活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他,于是,他相信“懒惰则是一个自然的能量”,并由此得出了“一种既极端又懒惰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在其后来的“致命策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对原始的、朴素的、自然的依恋情结在鲍德里亚中后期的思想中随处可见。当然,象征交换原则不仅仅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准

① J.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 II* (1987-1990), Verso, London, 1996, p. 7.

则,我们也很难说它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但不管怎样,鲍德里亚将这一原则重新捡了起来,并从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关系出发,得出了一种令人恐怖的“理论暴力”,这就与象征交换原则“互惠性”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显然,象征交换的原则并不仅限于鲍德里亚的一种解释,它应该还有更多、更广的解释。对此,这只能留待学界今后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了。

其三,鲍德里亚对现代技术社会的“超真实”、“仿真”、“仿像”的激烈批判态度。除了象征交换的原则之外,鲍德里亚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另一个重要转向,就是其“致命策略”理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建立在鲍氏对现代技术社会特征的认识和规定之上的。这一特征就是现代社会的“仿真”、“仿像”和“超真实”。“致命策略”理论使鲍德里亚与其早期思想分离开来,他由此彻底抛弃了早期所继承的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辩证法和异化论的观点,转而在现代技术社会的物的一种致命策略取而代之。而拥有这一策略的物的世界就是一个仿真的世界,或超真实的世界。所谓仿真或超真实,就是“比真实还要真”,是一种“超真”。有关这一点,鲍德里亚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在《公元2000年已经来临》中说到:“世界并不是辩证的:它在走向极端而非均衡;它热衷于彻底的对抗而非和谐或综合。它遵守的原则就是魔鬼撒旦的原则。这一点表现在物的狡黠的天赋中,表现在纯粹物的迷狂形式中,表现在它战胜主体的各种策略中。”显然,超真实的世界是受一个高科技主宰的世界,它既是物以其致命策略报复或颠覆主体的世界,也是一个“恶的透明性”的仿像世界,还是一个有着“完美的罪行”的虚拟世界,更是一个力图“谋杀本真的实在”的数码世界。当然,它也是一个与“象征交换原则”相对抗的世界。这个“超真实”表面上具有诸多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它又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一个“后现代”的世界,而是一个极端“前卫”、“超后现代”的世界。这就是鲍氏后期为我们所描绘的未来技术世界的哲学图画,一幅超真实的、透明的,但又是恶的、具有完美之罪的仿像世界。

鲍德里亚一生像走马灯式地不断地创造新概念,并转换其哲学

命题。惟其如此,其学术和其思想历程,非本“序言”寥寥数语所能概括。因此,我们还是借用他自己的道白来做本“序言”的结尾。

鲍德里亚在《冷酷的回忆Ⅱ》(1987-1990)中谈到,他一生的故事是:20岁是玄学家;30岁是情景主义者;40岁是乌托邦主义者;50岁横跨各个层面;60岁则在搞病毒和转喻。

更形象、更具体的概括见之于他的《冷酷的回忆Ⅲ》(1991-1995)一书的结尾,鲍德里亚用诗歌的形式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

使物作为体系
使生产为镜子
使死亡为交换
使世界为仿像

使恶得以透明
使大众保持沉默
使你的诱惑变得活跃
使你的记忆冷静下来

使你自身成为他者
使完美有罪行
使幻觉得以终结
在线上逗留片刻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高科技时代的消费 新趋向	1
一、物的规定及其特性	2
二、物的演变:从物到符号	9
三、符号消费与消费社会的形成	25
四、消费社会的神话及其批判	34
五、高科技时代一种无根的“新”文化观	41
第二章 从生产到象征:从现实原则到象征交换原则	53
一、象征的逻辑浮现:象征次序与符号次序	54
二、思想的转折:对马克思的拒斥	58
三、象征与象征交换原则	66
四、象征与现实的矛盾及其批判	87
第三章 仿真与仿像,内爆与超真实	92
一、仿真、仿像与表征	92
二、内爆与超真实	110
三、巴黎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的内爆解读	118

第四章 鲍德里亚与大众媒体技术理论	125
一、麦克卢汉、恩岑斯伯格的技术媒体观	125
二、鲍德里亚的媒体技术分析	131
第五章 诱惑、女权与技术的社会批判	149
一、诱惑、游戏与象征交换	149
二、诱惑与女权主义的社会批判	154
三、诱惑与技术的社会批判	159
第六章 致命之物与主体的命运	165
一、从物到致命策略	166
二、两种策略与致命的物	172
三、致命策略与庄子	175
四、后形而上学玄学的由来及其思想	178
五、海德格尔的“座架”与鲍德里亚的“致命策略”	183
第七章 完美的罪行与实在的辩护	190
一、完美何以有罪	190
二、完美的罪行并不完美——技术的报复	195
三、完美、虚拟与实在	198
第八章 鲍德里亚与后现代主义之争	203
一、鲍德里亚与后现代主义的归属	203
二、现代性的激进反对者	207
三、一个超后现代主义者	213
第九章 生产方式、数字游戏与技术责任	217
一、鲍德里亚技术思想的积极意义	217
二、生产方式的本原性与现代技术的生存方式	221

三、鲍德里亚悲观的技术决定论批判	225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237

第一章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

——高科技时代的消费新趋向

鲍德里亚对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真正肇始于他1968年出版的《物体系》一书。此后,鲍德里亚又在其出版的《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一书中,展开并丰富了他有关大众消费的文化理论。从《物体系》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早期鲍德里亚关于大众消费文化思想的形成。此一阶段,鲍德里亚总体而言还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并受到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理论的影响,如此,才有他对物的分析,并导致其第一本著作《物体系》的诞生。鲍德里亚力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开辟出自己的新领域。秉承其导师列斐伏尔对大众日常生活的研究,鲍德里亚就从人们日常生活每天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来揭示现代消费社会的本质和秘密,以达到破解大众消费文化的目的。鲍德里亚的这一研究突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在现代技术社会中的异化本质。他从人们对“物”的消费行为中,不仅仅看到了物对人的异化,他更看到了物的消费中实际蕴藏的“符号”的消费及其所导致的异化。

下面我们先考察一下鲍德里亚对“物”的研究,然后着力于鲍德里亚对现代技术社会中消费的本质分析。这里,我们试图在一个宽广的背景下来探究鲍德里亚早期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特别是他有关技术社会中物的分析和消费社会中的符号分析;并对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的逻辑理路做一追踪考察。

一、物的规定及其特性

《物体系》作为鲍德里亚学术生涯的开山之作,在其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虽然鲍德里亚后来的思想几经变化,例如从《生产之镜》开始,鲍德里亚逐渐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完全与马克思分道扬镳,展开了对马克思的全面批判,直至后期,鲍德里亚又开始转向后形而上学玄学的哲学问题的探讨;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在其后来的著作中看到其早期《物体系》的影子。甚至可以这样说,《物体系》中的“物”既是鲍德里亚学术生涯的起点,又是其学术的终点。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鲍德里亚不但没有离开他的“物”,反而又在这个“物”上大做文章,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学说。此是后话。现在我们还是先从鲍德里亚有关“物”的分析开始。

在《物体系》“导论”的开头部分,鲍德里亚首先对物及其分类提出了问题。他问到:

“试想,是否有可能将人类制造的繁多物品进行分类?有如草木虫鱼一般,区别为热带性、冰河性;标示其突变类型,或面临绝种的品种?在都市文明里,一代一代的产品,机器或新奇无用的玩意儿,层层袭来,前赴后继,相互取代的节奏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人反而变成了一个特别稳定的种属。”^①

鲍德里亚在“导论”开头的这几句话,与法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 M.福柯在其名作《词与物》的开头极为相似,他们谈到的都是如何对物进行分类的问题。M.福柯也是一个以研究“词”与“物”而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词与物》就是一部典型的探讨物的分类及其社会意义的著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一样,《词与物》试图建构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词与物》的目的是为了探求西方文化中作为知识对象的人的出现,以及相应的知识在不同时期的划分及其特

^① [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年版,第 1 页。

征。福柯运用“知识型”这一新术语来指称特定时期知识的产生、运动以及表达的深层框架。通过对文艺复兴以来知识型转变流动的考察,旨在表明各个时期的知识型之间所存在的深层断裂。与福柯类似,鲍德里亚的《物体系》一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探求物背后隐藏着的人、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对于这一点,鲍德里亚毫不隐讳,他在“导论”中直接说:

“我们分析的对象不只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的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①

当然,虽然鲍德里亚与福柯都对物非常重视,但他们二人的方法及其最终的理论归宿却相差甚大。甚至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鲍德里亚还写了一本《忘记福柯》的小册子,从他自己的理论视野出发,对福柯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抨击。只不过与福柯不同的是,鲍德里亚《物体系》出版的时间是1968年,当时的他还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而此时的福柯已经是声名鹊起,在法国家喻户晓。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看到,从对物的探讨开始,进而展开其学术里程,是他们二人的共同点,至于后来的差异及其争论,则是后话了。这里,我们对此做一简单的比较,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试图强调“物”的研究在现代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并引起人们对鲍德里亚的开篇论著《物体系》的重视。这也是本书所竭力强调的。

《物体系》试图从物的分类进行提问开始,但面对着现代社会中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诸多之物,如何对之进行研究,的确是鲍德里亚所面临的问题。通览《物体系》一书,其目标就是要建构一个日常消费活动中的异化批判。《物体系》一书着力阐述的是“物品如何有意义?”这一问题。该书除了导言和结论之外,分为四个部分:A. 功能性系统或客观论述;B. 非功能性系统或主观性论述;C. 后设和功能性失调体系:新奇的小发明和机器人;D. 物品及消费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从该书的结构看,前三个部分都是围绕着

^①[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页。

“功能性”体系而展开,而只有最后一个部分才涉及到了物品和消费体系,然而恰恰是最后这一部分才是全书的最重要部分,是鲍德里亚谈物体系的真正目的。从该书的布局结构可以看出,它通过对“物”的功能、非功能和功能失调的论述,其目的是为了导出“物”向消费社会中的符号的转变。在具体展开对鲍德里亚有关物的消费和符号消费的论述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了解一下鲍德里亚有关“物”概念的具体意义。

首先,鲍德里亚的“物”(objects)或“物品”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与商品有关的在日常生活中被大众所消费的东西,也就是日常生活消费之物,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和人经常打交道,和人发生日常生活关系的物品。《物体系》所面临的任務就是对这些物进行分类和研究。鲍德里亚说:“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不断地繁衍,各种需要也一直增加。制造界不断地加速它们的生死周期,人的词汇显得不足以应付。有可能对这种朝生暮死的物世界加以分类,进而完成一个描述体系吗?”^①

显然,鲍德里亚《物体系》一开始所谈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日常生活之物。虽然他在书中对物没有进行具体的规定,但纵览《物体系》一书,其通篇都是在这一意义上谈物的。例如,他经常所举的例子,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和家具、咖啡壶,等等,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物品。这里,有一点必须强调,鲍德里亚所谓的“物”,不涉及到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也即按照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进行分类的物。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界的种种生物的鉴别分类,人已经做到了。甚且,在有系统进行这项工作的时代,人类也透过百科全书的方式,将各种实用物品及其相关技术,进行了详尽的分类记载。”^②

所以,生物学上那种按照种、属、纲、目、科等对物种加以分类的物体系的划分,肯定不在鲍德里亚的考虑之列。那么,在一般人看来似乎简单的“物品”,为什么会引起鲍德里亚如此大的兴趣呢?

① [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页。

② [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页。

其实,在貌似简单的“物”的概念里,蕴涵了鲍德里亚主要的思想。这就涉及到对物的更具体的规定。

其次,鲍德里亚的“物”是包含了高科技成分或元素的技术之物。鲍德里亚所谓的物,自然包括一般的日常生活之物;但其物品的范围绝不仅限于此,而是涵盖了技术物品。因为我们众多的日常生活之物,其实大多是从科技之物的普及化而来的。例如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汽车和冰箱,等等,从技术方面而言,它们都是高科技的产品。只是这些产品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逐渐变得普及,而变成了日常生活之物。所以,谈论物,必然离不开高技术,离不开物品与技术的关联。从早期的《物体系》中日常功能之物开始,到消费社会中的“物”及其演变,及至他的“仿真之物”和后期的《致命策略》中命定之“物”,鲍德里亚前后期“物”的含义虽有所变化,但物的科技色彩,或技术之定位,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从《物体系》导论开始,鲍德里亚就对这一点给予了明确的说明。他说:“对于这个物的结构语意系统的研究,也就是对物所安设的一套或多或少合理意志的意义构成系统的研究,必须假设在物的结构语意系统之外,有一个可与其分离的层次。此层次结构更为严谨,并将超越功能描述的范围之外[它便是]:科技层次……物品最具体的一面便是科技,因为科技演进与物的结构变化实为一体。严格地说,物的科技层次的变化是本质的,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里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我们必须由技术模型紧密一致的结构层次出发,才能理解为何物会被生产及消费、被拥有及被个性化。”^①

所以,技术视野下的物,构成了鲍德里亚《物体系》研究的核心。当然,无论如何,鲍德里亚对物的考察有一个过程。这一点在《物体系》中体现的尤其明显。《物体系》基本涵盖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

再次,鲍德里亚的“物”指的是高科技产品结构中非本质部分,或曰是从技术本质所引申出的意义的层次。说物品包含了高科技

^① [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2-3页。

的成分,甚至如技术哲学之言,是技术制品,这一说法不是太确切,并不完全符合鲍德里亚所谓的物。科技制品都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功能,都有自己的技术的结构性。如手机是一个高科技制品,其主要功能和结构是通话技术的研制和应用;轿车也是现代高科技的制品,其主要结构和功能也都包含了诸多高技术的研发。这些立足于技术本身的高科技产品都有其各自的功能结构和特性。但《物体系》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高技术物品的结构或本质构成,而是在原来的技术结构或功能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非本质的意义。所以,鲍德里亚说:“我们在此感兴趣的,便是这种干扰: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如何大起争执,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因为它虽有基本的真理,物品的生活体验真象却持续地和它分离。我们的实用物品都参与一到数个结构性元素,但它们也都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①

这里,鲍德里亚所谓的“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的争执,指的就是物的主要功能或主要结构部分,与因人的需要而衍生出来的不合理性的直接冲突,而这一衍生出来的需要的不合理性,显然就不再属于“科技模型”;这一衍生的部分常常是基于日常生活体验的,它们“持续地逃离技术的结构性,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逃离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所以,鲍德里亚认为:“形式和技术的引申意义还会增益功能上的不和谐,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 (inessentiel) 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 (essentiel) 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②

为了更详细地说明科技制品核心功能与其附属性能的关系,鲍德里亚还以一个磨咖啡机为例加以说明。对于磨咖啡机而言,核心关键部分,即他所谓的“本质必要的”和“结构性的”部分,也就是最具体“客观的”部分,是其电动引擎,是发电厂提供的能量,是能

① [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5-6页。

② [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6页。